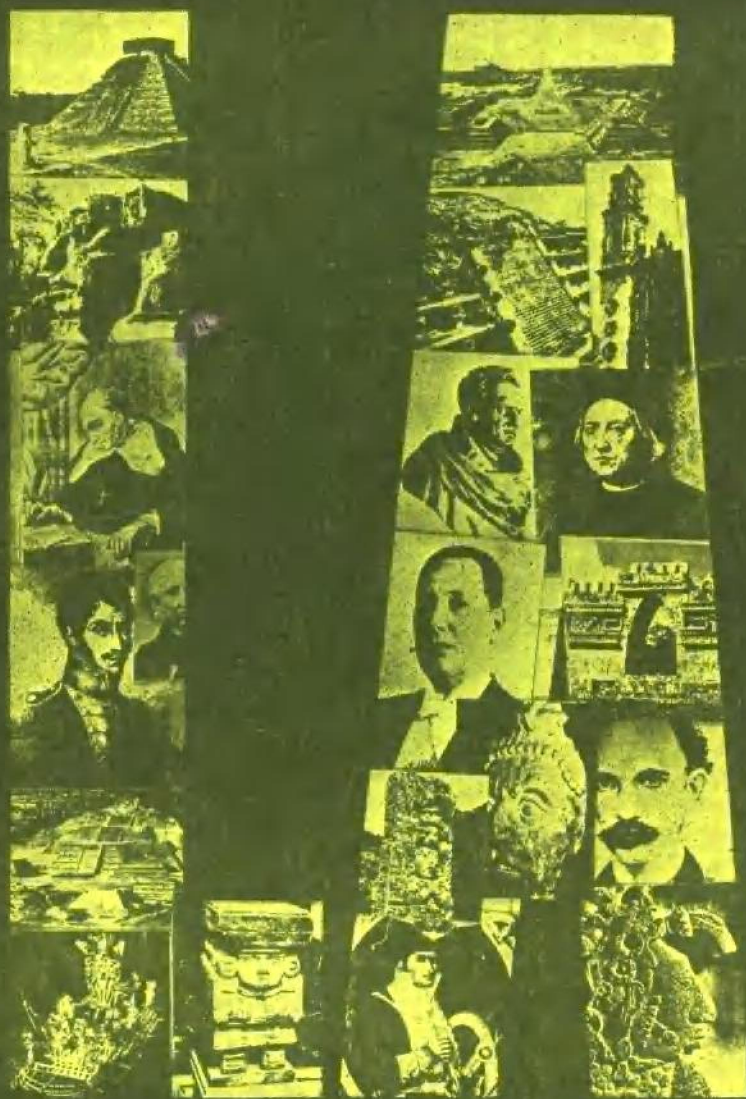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史论文集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



11.2-942/2



11.2

1342790

拉丁美洲史论文集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

RD56/0



拉丁美洲史论文集

LADINGMEIZHOU SHI LUNWENJI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850×1168/32 11.25印张 268,000字 001—960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東方出版社出版 书号 11453·21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定价 1.95元

前 言

本论文集的文章，主要选自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所收到的论文，另外还有我国拉丁美洲史学者专为本集撰写的新作。有部分文章已在其他刊物上先行发表，在收入本集时，均经作者作了修改。

本文集总共选择了十八篇文章，按历史顺序进行排列。各篇文章的观点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本研究会或出版单位。

拉丁美洲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们热切地期望我国有更多的学者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使这门学科得到更大的发展。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进一步开展拉丁美洲史的研究.....	中国拉丁美洲史 研究会理事长	李春辉 (1)
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		
——兼论文化传播问题	北京大学	罗荣渠(5)
光辉灿烂的玛雅文明	北京师范大学	胡春洞(36)
拉斯·卡萨斯的反殖民主义思想		
及其斗争	外交学院	梁卓生(51)
秘鲁历史上的“米达”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凯(65)
浅论委托监护制和《布尔戈斯法》.....	河北大学	乔明顺(94)
独立战争前夕西属美洲资本主义		
因素问题考察	北京大学	林被甸(108)
论西蒙·玻利瓦尔及其政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萨 那(133)
试论墨西哥独立运动的特点和		
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秦海波(154)
巴西独立的特殊道路	湖北大学	陈海燕(172)
略论墨西哥《1917年宪法》的特点和意义	南开大学	洪国起(192)
论卡德纳斯执政时期的土地改革	复旦大学	林 宁(218)
略论桑地诺的反帝斗争	北京师范大学	曾昭耀(241)
试论庇隆与庇隆主义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肖 枫(261)
美国与古巴独立战争	中山大学	吴机鹏(282)

简论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初期关系.....	山东师范大学	王春良(297)
美国与巴拿马运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苏振兴(317)
清季我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首次		
建交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沙 丁 杨典求(336)

进一步开展拉丁美洲史的研究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 李春辉

拉丁美洲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印第安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殖民主义者入侵后,拉丁美洲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以及农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欧市场,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叶,拉丁美洲爆发的规模宏大的民族运动,是在世界范围内对殖民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近年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经济正以令人注目的速度向前发展,给第三世界人民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前,拉丁美洲人民正与第三世界人民一道,在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中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尽管拉丁美洲如此重要,但我国对拉丁美洲史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解放前,我国对拉丁美洲史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对中、拉关系等某些课题进行一些探索。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只零星出版过几种有关拉丁美洲史的译作。五十年代末古巴革命胜利后,我国人民与拉丁美洲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有所发展,对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的历史系先后开设拉丁美洲史的课程。这些学校成为我国第一批教学和研究拉丁美洲史的拓荒者。与此同时,我国还

专门建立了一批研究拉丁美洲史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设立了拉丁美洲史组，该院并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湖北大学等院校的历史系亦相继设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在那段时间内，有些拉丁美洲史学者开始陆续撰写介绍拉丁美洲史的文章。这些文章简明地叙述了拉丁美洲的悠久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为拉丁美洲史知识普及和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十年“浩劫”中，拉丁美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遭到了挫折。在此期间，只有少数拉丁美洲史学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间除了我的抛砖之作《拉丁美洲国家史稿》（1973年初版，1983年经修改、补充，改名为《拉丁美洲史稿》重新出版），还翻译出版了一部拉丁美洲通史和一些拉丁美洲地区史或国别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教学单位开始恢复拉丁美洲史课程，研究单位开始恢复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工作，从而在我国出现了一个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崭新局面。

1980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杂志《拉丁美洲丛刊》，世界历史研究所还创办了《世界历史》杂志。这些杂志的创办为我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工作者开辟了重要园地。许多拉丁美洲史研究工作者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些园地里发表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提供了不少资料，并逐步开展有关拉丁美洲史问题的学术讨论。

近年来，我国对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已取得一些进展。对古代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渊源与古代印第安社会性质开始了一些探索；对西班牙、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制度同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统治制度作了一些比较分析；对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

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对现代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有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对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当前拉丁美洲各国的社会性质作了一些考察；对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关系也开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已修订出版拉丁美洲通史一部，普及读物十余册，发表论文和文章达百余篇。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拉丁美洲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拉丁美洲史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国内拉丁美洲史教学人员、研究工作者的联系和工作协调，1979年12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目前已有会员两百余人，其中既有专业工作者，亦有业余爱好者；既有研究人员，又有教学工作者。他们虽然分散在祖国各个地区，但是在研究会的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工作，并进行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拉丁美洲史部分的条目等工作。研究会先后举办过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集中地讨论了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当前民族民主运动诸问题，举办过一次玻利瓦尔专题学术讨论会，还举行了一些学术报告会和学术座谈会。拉丁美洲研究会定期编辑出版会刊，发表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互通了学术情报。正是在近年来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拉丁美洲史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选题广泛，既涉及到古代史、近代史，又涉及到现代史；既涉及到经济基础，又涉及到政治、思想意识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例如，有关于扶桑国考证和美洲的发现，拉丁美洲的米达制、拉丁美洲的委托监护制和布尔戈斯法，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前夕资本主义因素的考察、玻利瓦尔及其政治思想、墨西哥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等等重大课题。这些论文，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拉美历史上的一些主要问题作出分析，材料比较丰富，观点比较鲜明，具有一定的学

术价值。这本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水平。论文集的出版,是我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中的大事,无疑会引起史学界的注目,有助于拉丁美洲史的研究。

虽然拉丁美洲史研究近几年来取得一定成果,但它毕竟是我国史学领域中一门新的学科,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当前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水平,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国史研究和提高精神文明的需要。任重道远,我们热切期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它、培育它,以进一步开展对拉丁美洲史的研究。

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

——兼论文化传播问题

北京大学 罗荣渠

我国史籍浩繁,其中涉及许多域外的地名国名,至今不详其所在,甚至真伪难辨。史学工作者或予以考证,或提出假说,本来是学术上常见之事。根据《梁书·诸夷传》上扶桑国史料提出的所谓中国僧人慧深在五世纪时发现美洲的假说,早在两百年前由法国汉学家德·吉涅提出,在西方汉学界进行过争论,迄未获得学术界承认。在西方研究中国的第一流学者中,从希勒格^①、劳弗尔^②、考狄^③到李约瑟^④等人,无不对此说持异议。但近年来,由于有人提出新考证和新发现,这个老问题又被提出来。继六十年代有人在《北京晚报》^⑤和学术刊物^⑥上写文章支持这一假说之后,最近又有人在我国报刊、广播、科普读物、历史著作上谈论这个问题,甚至写成国际报道,宣扬为古中华的光荣。

难道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真有什么新发现和新突破吗?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地理发现史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加以认真的探讨和严肃的辨析。

一份慧深的假履历表

所谓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假说,是根据《梁书·诸夷传》有

关扶桑国的记载提出的。如何解释这段史料，历来是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我过去就认为扶桑国传说的真实性十分可疑，曾做过一点辨析。^⑦近年来，国内外有人对这段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尤其是对《梁书》上讲述扶桑国传说的慧深和尚的国籍和履历作出了新的考证。这以马南邨在《燕山夜话》和朱谦之在他的论文中共同提出的论证最为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现在，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因为如能查明慧深是何许人，虽不能推断扶桑是否就是墨西哥，至少可以使问题的讨论大大推进一步。

《梁书·诸夷传》扶桑国条开宗明义说：“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梁书》卷五十四，列传四十八）。这段话语法简明，确认慧深是扶桑国人，谁也不会误解。但这么一来，中国人发现美洲的假说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可是，《燕山夜话》却为此作了新的辩解。作者从《高僧传》查到一位中国国籍的慧深，即南朝著名高僧慧基的弟子“沙门慧深”。两人同名，又都是和尚。于是认定扶桑国的慧深就是慧基的弟子慧深，这样，似乎慧深的国籍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梁书》上的“其国有沙门慧深”又如何说得通呢？作者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慧深远游美洲数十年，回到荆州时“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⑧。朱谦之教授不但完全同意这一看法，而且根据同样的考证方法，又从《魏书·释老志》上查到另一个“沙门统慧深”，认定与《高僧传》上的慧深和扶桑国的慧深同是一人。为什么要扯出第三个慧深呢？原来《魏书》上提到元魏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时有罽宾国沙门及其同辈五人在京都一事。于是作者又按大胆的假设推理：僧人都是“大游历家”，既然他们可以从罽宾到中国来，也就可以从中国到美洲了。这样就同《梁书》上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有比丘五人游行至扶桑国的记载，完全吻合了。然后作者就把三个不同国籍、不同地区、不同事迹的僧人硬捏在一起，编成

了《慧深年谱》。这样，慧深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上的人物”。

对于《慧深年谱》的虚假性，我国研究佛教史的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早就撰文作了分析，此处只把他的结论性的意见摘录如下：

“《高僧传》的慧深是在江东，并于496—519年之间的某些年曾任江东僧正（姑假定为510—518年）；而《梁书》的慧深是在齐永元元年（499年）在荆州；《释老志》的慧深是北魏的沙门统，于永平二年（509年）上走立僧尼制。这三个慧深的活动，可以说差不多是同时，而他们所处的地区，距离很远。中国人同时同名，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僧人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明确的根据，很难说同名同时就是一人。”^⑨

《慧深年谱》对于不懂考据的读者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仔细一推敲，却是穿凿附会，漏洞百出。《年谱》认定扶桑国的慧深原是宋齐时著名的高僧慧基的弟子，又说他是宋大明二年（458年）随罽宾国比丘五人游行去扶桑国，而且“当为其向导”。按此推论，慧深在此以前早已到过扶桑国，否则如何能当向导？一出国，就是40年，齐永元元年（499年）回国时，他的老师慧基已去世。《高僧传》称：慧基的弟子慧深后来接掌僧任。既然慧深云游海外40多年，老师死后三年才回国，而且又被人误认为是外国人，怎么会有可能继老师而接掌僧任呢？既然他在美洲宣扬佛法、立下了佛教史上空前绝后的丰功伟绩，为什么《高僧传》竟然一笔抹煞呢？再说，《年谱》写道：“慧深返国时，刘宋已亡，至是萧齐亦亡，乃北上为元魏宣武帝沙门统”。这就是说，慧深回国后听说老师已圆寂，又弃国他投，奔往元魏宣武帝门下，根本没有去江东接掌老师的僧任。在这里《高僧传》上的慧深与《释老志》的慧深根本对不上号。为了硬要对上号，只好借用《高僧传》证明慧深是中国国籍，找出两人同名就行

了。但这种粗心的同名“考证”法虽然很省事，有时却会出一些麻烦。例如《年谱》作者所引证的这个慧深见《高僧传》第八卷，同书第十二卷《法光传》上还有一个慧深在永明末（491—493年）为人“起灰塔”^⑩。这时前一个慧深还在美洲没有回国。如果说这是另一个慧深，那么，为什么那个江东的慧深一定是从扶桑国来的慧深呢？再者，南朝时佛教流行，修《梁书》的姚察自幼喜欢佛教，还受过戒，与佛教人士交往密切，^⑪怎么能竟毫无根据地说他把一个中国僧人错认为外国人呢？所谓的《慧深年谱》完全是曲解和割裂史料的产物，予以澄清，很有必要。

一个虚构的美洲扶桑国

近年来有关扶桑国的新考证，在国外以美国人亨利埃特·默茨女士的《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记录》（以下简称《淡墨》）一书^⑫最为著名。该书的前一部分论证《梁书》所记扶桑国即墨西哥。此书一出，有关扶桑国的争论在西方似乎又趋活跃。国内持扶桑即墨西哥说者也常引用该书。

如果说《年谱》的作者要千方百计在中国史籍中找出慧深其人的确凿证据，那么《淡墨》的作者则是要在墨西哥其地查出慧深活动的全部踪迹。为了寻找扶桑，历来研究者都在扶桑木上下功夫。《梁书》说扶桑国以扶桑木而得名，如能考证出扶桑是何种植物，产于何地，是比考订慧深更为有力的物证。《梁书》对扶桑木的基本特征写得相当清楚：一、“叶似桐”；二、“初生如笋”；三、“食如梨而赤”，“国人食之”；四、“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五、“以扶桑皮为纸”。这五大特征表明，这种扶桑木与我国古籍中传说的另一种神木扶桑根本是两码事。多年以来，持墨西哥说者都把扶桑木说成是墨西哥的特产龙舌兰。因龙舌兰汁可酿酒，纤维可织

布造纸,其他特征也就可以凑合过去。唯龙舌兰果实不能食,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大漏洞。于是,《淡墨》一书提出一种新假说,认为扶桑木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基本粮食作物玉米。玉米的果实虽与梨不相似,但其穗确有赤色者,而且是举国食之。默茨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论点的:“蕙深把这种作物的生长比作竹子。在美洲植物中再没有别的东西比到处都是的玉蜀黍长得更象细长而高的竹子了。玉蜀黍上生长的玉米棒子吐穗的形状与初生的竹笋十分相似。据说人们吃扶桑的嫩苗,果实保存一年也不会坏。……”^④这是从扶桑木的形状立论的。显然,作者由于不懂中文而把“竹”与“笋”混为一谈了。《梁书》说“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这段话语法不严密,可以理解为扶桑叶似桐,初生的叶如笋,叶可食。这样讲,默茨的玉米说就很难成立。也可以理解为扶桑叶似桐,这种植物生时象笋,是一种可食的植物。这样理解,玉米说也很勉强。因为如果扶桑树长得象笋而不象竹,就很难说与玉米形状相似。至于扶桑的其他特征,玉米都不具备。因此我认为玉米说还不如龙舌兰说较能自圆其说。

默茨提出的扶桑木即玉米说,近来在国内不但有人附和,而且走得更远,甚至说中国可能早在上古时期就开始种植和食用玉米。^④这就把玉米种植起源于美洲的公认的说法也推翻了。但证据所在呢?据说是成都万佛寺六朝石刻上有一种树木是扶桑木,而其叶状看起来正是玉米形象,而且简直逼真到“呼之欲出”的地步。细读这一考证所使用的推论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的:大前提——中国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扶桑木的记载,而目前又发现形状象玉米的扶桑图像;小前提——玉米是一种粮食作物;结论——中国古代早就开始种植并食用玉米了。这种连形式逻辑的原理也不遵循的考证推理,是完全不能服人的。

不错,如果看图识字,万佛寺石刻上的所谓扶桑树,长着两边

分开的长叶，未尝不可看作是象征主义手法的玉米图像。但把这种长叶植物认作是芭蕉、椰子等也无不可。关键的问题是，作者所认定的这种扶桑树的形状，与我国古籍中的扶桑木的叶状恰恰是对不上的。例如，据《山海经·大荒东经》上记载，扶桑“其叶如芥”；《十洲记》上说，“叶似桑树”；《齐民要术》上说“磐蜿而下屈”，等等，哪种说法都引不出扶桑叶似玉米叶的结论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殉葬帛画上的扶桑木图像，正好与古籍上的神木扶桑的形象相近，而与玉米攀不上。如果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玉米的国家之一，而慧深来时谈到这种植物，人们竟然茫无所知，那未免也太荒唐了。

最近又有人提出一种新说，把扶桑木解释为棉花^⑩。据说，棉花大体符合扶桑木的三个基本特征：一、叶似桐；二、实如梨；三、可为布为衣。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棉花说与玉米说同样偏颇。玉米说主要抓住扶桑“初生如笋”和“国人食之”的特征，置其余特征于不顾。棉花说则主要突出扶桑的叶状及其织布为衣的功能，而置其它的特征，特别是作为食物的特征于不顾。仅就织布而言，也难以自圆其说。《梁书》写明是“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以扶桑皮为纸”，讲的都是这种植物树皮的功能，与棉花显然对不上号。可见，棉花说较玉米说还略逊一筹。

除了提出扶桑即玉米的新说外，《淡墨》一书还提出了许多新论点。这些新论点与《慧深年谱》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年谱》千方百计要把传说中的慧深在中国变成真人真事，《淡墨》则进一步把他树立成为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真神——克利科阿特尔。他所采用的手法，如作者所说，是“随意挑选出三个词”^⑪：慧深(Hwui Shan)、比丘(Pi-k'iu)和释迦(Saka)，然后在美国西部和墨西哥的地图上寻找出带有与这三个词音相近的词头词尾的地名，如 Huepac, Huilacatan, Picacho, Zacatecas, Zacapoaxtla……，解

释成为当地为怀念这位中国高僧而命名者，从而把慧深在美洲从墨西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亚利桑纳等处“漫游”的行踪在地图上连成一条线。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赞扬慧深把一个国家的信仰都改变过来，凭这点就应“跻于世界上伟大的宗教大师之列”，“其教导在一千五百年后仍在心地善良的墨西哥人民中留下印记”^①。从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作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编造出来的扶桑国的西洋迷宫之中。事实上，再没有比用佛教这个论据更便于否定扶桑即墨西哥说了。因为佛教与古代墨西哥印第安人信仰的原始宗教和巫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体系。印第安人的宗教在整个古代印第安文明中都处于支配地位，在古代墨西哥生活中打下深刻烙印。慧深在美洲的传教活动既然在地名上都留下了深远的纪念，难道在其他方面仅仅留下什么莲花装饰花纹或所谓象鼻形图案么？难道在宗教建筑物和雕刻都很盛行并有大量遗物保留下来的墨西哥，只剩下几尊很不象样的所谓佛像么？

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

近年来在论证扶桑即墨西哥的文章中，有人提出，考证的价值并不在于一时一事，重要的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他们说，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中国就发明了指南针，造船和航海技术也很发达，欧洲人能够做到的事中国人也能做到，为什么不可能在纪元五世纪横渡太平洋到墨西哥呢？根据这种可能性，有人把中国人发现美洲的年代又远推一千年，说什么“扬帆美洲三千年”^②。

既然提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有必要来认真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从世界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在哥伦布之前，中国的